

困惑与冲突

——当代中韩女性小说之比较

陈铉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困惑与冲突——当代中韩女性小说之比较/陈铉美著.—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灯下学术文丛)

ISBN 7 - 80647 - 450 - 1

困... 陈... 妇女文学 - 对比研究 - 中国、韩国 - 当代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170 号

书 名:困惑与冲突——当代中韩女性小说之比较

作 者:陈铉美

出 版
发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

字 数:19.2 万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4.20 元

ISBN 7 - 80647 - 450 - 1 I·306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号码:0791—6893619 6894717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乐黛云

陈铨美博士的专著《困惑与冲突——当代中韩女性小说之比较》是一本颇有特色的书。关于中韩两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著作已有不少,但专注于研究 80—90 年代中韩女性小说的书,这恐怕还是第一部。

这部著作既追溯了两国妇女的历史传统、文学传统,又集中讨论了 20 世纪末叶两国女性的生活及其在小说中的反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摆脱了过去一对一式的作家与作家之间的简单比照,而从总的历史潮流和思想倾向来分析。作者往往是在大体类似的背景下,条分缕析地辨明中韩女性创作的不同。例如在研讨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双重角色时,作者指出从当代小说来看,中国女性由于有了从 30 年代就已开始的五十年社会革命传统,这一传统使她们作为一个“人”,早就承担了建设社会的“半边天”的重任。进入 80 年代时,她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找回“女”人特有的精神心理特征,重温女性对于家庭、孩子的自然渴望,重新看重女性的家庭责任;而在韩国的现实社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酷统治和儒教陈规的压抑,女性备受男性中心的家庭所束缚,甚至连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也只是为缔造“成功的婚姻”。因此,韩国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女性所面临的恰恰相反,是突破家庭的闭锁,争取“人”的全面价值,成为社会积极的一员。

以上只是举一个例子,《困惑与冲突——当代中韩女性小说之比较》一书多半以这样的方法论,在比较中探究了八、九十年代中韩小说所表现的中韩当代女性的女性经验,如女性视野中的男性形象、性在女性角色中的位置、“姐妹情谊”等等。同时,又试图进一步探索女性话语的建构,并质疑“西方女权主义是否适合东方国情”。她尖锐地指出:西欧女性主义者主张“为‘更加不幸的姐妹们’开辟道路,由此为自己赋予了令人生疑的‘指路特权’,造成了‘开路的我和无法开路的你’之间无法消除的分裂”。作者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虽然是对自身文化传统中父系传统霸权的挑战,但在西方文化东扩的大格局中,它仍然沾染了“准霸权话语”的色彩,其主要表现是将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与价值情怀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女性主义纲领推向全世界。作者用中韩女性世界的大量实际材料证实了这种做法的悖谬,说明了重建东方女性话语的绝对必要。当然,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开了一个头,虽然不乏睿智的思考,但也不过是吉光片羽,还有待于更大的提高。

总之,这是一本真正用了数年苦功积累材料、认真思索的结晶,绝非一般追赶时尚、浮躁敷衍之作可以望其项背!作者陈铨美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研习四年,终于取得博士学位,并有机会在北大东语系担任见习讲师,我很为她庆幸。在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多名韩国女学生中,铨美称得上是灵慧而敏锐的。命运对她似乎也别有偏爱,她有成功的事业,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当然,作为一个女性,她也难免要挣扎于她曾深入研究过的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角色的矛盾之中,但我坚信她有智慧、有能力度过难关,得到和谐与圆满。

目 录

| | |
|----------------------------|--------|
| 序..... | 乐黛云(1) |
| 中文提要..... | (1) |
| 绪 论..... | (1) |
| 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背景..... | (1) |
| 第二节 本书所使用的主要概念界定..... | (2) |
| 第一章 现代中韩女性文学回顾..... | (5) |
| 第一节 儒家文化圈传统伦理体系内的女性角色..... | (5) |
| 第二节 中韩女性文学的第一次高潮及其背景..... | (8) |
| 第三节 几个引人瞩目的特例 | (34) |
| 第二章 质疑双重道德标准 | (47) |
| 第一节 双重角色与双重道德标准 | (49) |
| 第二节 消解传统的女性角色 | (67) |
| 第三节 “愤怒的女性” | (83) |

| | | |
|-----|-------------------------|-------|
| 第三章 | 挖掘“女性经验”..... | (100) |
| 第一节 | 女性视野里的男性形象..... | (100) |
| 第二节 | 性在女性角色中的位置..... | (109) |
| 第三节 | 私人化的“女性经验”..... | (120) |
| 第四章 | 探索女性出路..... | (137) |
| 第一节 | 建构女性话语..... | (138) |
| 第二节 | 女性写作的非文本意义..... | (156) |
| 第三节 | “姐妹情谊”剖析..... | (170) |
| 第五章 | 批评的回应..... | (180) |
| 第一节 |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东方国情？ | (180) |
| 第二节 | 如何重建女性话语？ | (196) |
| 第三节 | 女作家方向感缺失的原因..... | (216) |
| 结 语 | | (230) |
| 附录一 | 中韩现当代女性文学作品要目..... | (232) |
| 附录二 | 参考文献..... | (241) |

中文提要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双重角色;女性写作

本书重点关注中韩两国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女性小说的比较研究课题。对 80 年代之前的女性文学以时代背景为梳理框架,对 80 至 90 年代的女性小说则采取主题比较研究的方式。

性别批评因特别关注社会文化问题而被认作 19 世纪社会文化批评的复兴。本书写作的理论背景与此有直接关系。性别批评在内容与方法上对传统批评的颠覆波及文学活动各领域,它从性别角度切入文本,对作品形象、阅读接受、写作策略等文学整体流程的各阶段进行重新审视。本书批评方法主要是性别批评,主要视角是比较文学的批评方法,兼及人类文化学批评、原型批评、社会历史学批评、民俗学批评等等。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儒教文化圈,具有许多类似的性别问题。两国女性在久远的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屈从于父权文化权威,遭受性别压抑,一直处于社会与历史的底层和边缘。中韩两国由封建制向近代社会的转变,都是在外来力量作用下经过剧烈的社会震荡完成的。民族危亡的时局,引发了中国五四运动与韩国三一运动这两场相距不过两个月的民族救亡运动。引进西

学强国富民,也是两国革命者共同的选择,其中最能感动女性的是本国男性首先倡导的“平等”与“自由”理论。上述种种,是中韩两国文化及后来女性文学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当然,本书也十分重视两国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民族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历史进程、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下的不同面貌。

中韩两国早期女作家虽然创作了不少表现女性命运的小说,但与男作家相似,主要是从社会问题角度表现女性的不幸。除了在观察、描写上显露出一些女性特点外,这些作品并没有显示出女性独特的优势。事实上,女人写小说这个事实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往往使她们引人注目。随着反封建运动的深入,“女性解放”、“婚姻自主”成为新女性的口号,女作家的女性意识逐渐萌醒,并在当时流行的爱情婚姻和个性解放的题材中表现了自己女性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将女性作为受压迫阶级的一方引入革命阵营,而她们相信,一个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必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到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即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在政治和法律的形式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在这种女性“大跃进”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女性文学呈现出模式化格局,即歌颂女性走出家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歌颂各行各业的女劳模、女英雄,歌颂女性与封建残余观念斗争的勇气等等,而且相当多的女作家不再特别关注女性题材创作。“文革”期间,女作家大都辍笔,“文革”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公式化现象更为严重,“革命+恋爱”模式变成了只能革命不准恋爱的公式。

当中国女性由于政治权力而成就了社会的男女平等并投身

革命之时,韩国以父权家长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使女性的被压抑状况依然很严重。由于40年代历史危机下的艰难时局和保守化倾向,韩国女性始于20至30年代的主体性探讨没有能够坚持下来,而走出“玩偶之家”的“娜拉”们所面临的必然是黑暗与挫折。50至70年代可谓韩国全民族的悲剧时期,不仅女性,所有人都是边缘人以及孤独的被冷落者。主外的男性和主内的女性、家外的“荡妇娼妓”和家内的“贤妻良母”,诸如此类,界线分明的对立极其尖锐。希望通过结婚安驻于家庭,成为韩国女性自发的内在意愿。由于这种状况,女作家们以虚无、消极、被动的态度应对女性问题和社会现实,并有某种向先验的宿命论或浪漫爱情逃避的倾向。

对当代中韩女性小说,本书进行了多主题平行比较分析。在各个主题研究过程当中,注重将比较文学原理与性别批评的实践相结合,从而得出真实可靠的结论。

女性角色的“双重道德标准”是困扰当代女性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虽然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文化的父权性质。人们只强调女性的社会性的“人”的特征,却回避女性长期累积的“女”人的精神心理特征。这种靠权威政治力量维系的局面,既促使中国女性在短期内产生了历史性的飞跃,也让她们为这种飞跃付出了沉重的现实代价。当代女作家开始敏锐地反思这一问题,怀疑的主要依据是追求事业的女性并不能因此摆脱女性传统家庭角色的纠缠。许多女性不得不在两条战线同时去拼命,成为“女强人+贤妻良母”的“超级女性”。这种难以调和的角色冲突和生存困境,依然是社会主流文化并没有放弃的父权

文化性质造成的。

由于受到 70 年代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影响,韩国女性小说更富于极强的社会意识。女性开始对家长制中本身的角色感到悔恨并开始追求自我的存在价值。然而韩国的家长制观念似乎比中国更顽固,女性的双重角色问题更像是由男性直接压迫而造成的。韩国女性小说不得不对此进行激烈的控诉,其中的女性可以说是一代“愤怒的女性”。

男性不仅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两性关系的主宰,而且在反抗封建制度与封建道德的过程中,也一直是女性精神上的导师和战友。经过“文革”震荡后的中国,女性突然发现了理想的男性越来越难找。这些男人不仅不配再做她们精神上的导师,而且很多人已经成为阻碍女性成长与自由的绊脚石。男性角色由“英雄”向“小人”的转化,已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学的主流倾向之一。越来越多的男人自身也陷入困惑状态,自然也就没有再给女性指引方向的能力。

韩国女性文学则把男性作为父权家长制的受益者与代言人而加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女性自我的立脚点。

中韩两国当代女性文学更多地探讨了女性角色自身的一些问题。如何还父权文化背景下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以本来面目,是许多女作家的共同选择。她们首先采取消解女性传统角色的做法,传统的贤妻良母和天使般的少女形象以及由此产生的爱情神话受到怀疑和冲击。

中韩传统文学及早期女性文学都竭力回避性对女性角色的影响。在传统男作家笔下,良家妇女是没有性欲的。初期女作家也刻意描写不涉及性的女性的精神恋爱。在两国当代女作家

那里,曾经为逃脱贫困而呈献给男性的女性身体终于变成了愉悦自己的肉体,并成为女性主体精神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抗权威话语、消解宏大叙事的 90 年代,私人化的女性经验借助后现代主义的潮流成为女性小说创作的热点问题,并在批评界引起很大反响。这种中韩两国几乎同时出现的女性写作姿态是本书分析探讨的重点之一,这也是两国女性小说共有的热中于写作的女主人公形象的精神源头。本书为此特别对女性写作的非文本意义进行了研判。

西方性别批评理论有一个著名论断,即用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来对抗父权社会对女性整体的歧视与迫害,这种观念给中韩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带来了直接影响,本书对其得失进行了分析论证。

中韩两国女性文学的实践给性别批评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本书在第四章对此进行了必要的分析研判。

第五章则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东方国情进行了初步的分析。20 世纪的中国人和韩国人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已经被相对边缘化了,而作为一直处于民族文化底层的中韩两国女性,实际上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由此引发的理论输出国话语背景与理论输入国话语背景的差异性摩擦不可避免。本书还对如何界定女性意识、如何重建女性话语、女作家方向感缺失等敏感话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

绪 论

第一节 本书写作的背景

本书重点关注的是中韩两国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女性小说的比较研究课题。因此,对 80 年代之前的女性文学,以时代背景为梳理框架;对 80 至 90 年代的女性小说则采取主题比较研究的方式。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也将从欧美女性主义批评对中韩两国的影响做另一个角度的影响比较研究。

性别批评因其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特别关注而被认为是 19 世纪社会文化批评的复兴。本书写作的理论背景与此有直接关系。

由男性中心话语的批评传统导致女性形象的失真,性别批评这种建立在性别立场上的反思从本世纪 60 年代开始,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在妇女争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寻求自身彻底解放的思想背景下,性别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试图通过对西方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完成一种破旧立新的话语变革。它以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

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与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从文学、语言和心理等多角度对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向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学史和美学观念提出挑战,以达到发掘女性语言、梳理女性文学史、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标。我们认为这是性别批评发展的初级阶段。

性别批评从性别角度切入文本,使文学批评具有了全新的面目。性别批评在内容与方法上对传统批评的颠覆波及文学活动的各个领域,它对作品形象、阅读接受、写作策略等文学整体流程的各个阶段都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本书运用的主要批评方法是性别批评,主要视角是比较文学的批评方法,兼及人类文化学批评、原型批评、社会历史学批评、民俗学批评等等。

第二节 本书所使用的主要概念界定

“当代”概念,系指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仅指中国大陆的当代女性文学,未含港、澳、台地区;

“韩国女性文学”,在 1945 年前指整个朝鲜半岛,1945 年后仅指大韩民国;

“妇女文学”,泛指由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

“女性文学”,由女作家创作并特别反映了女性情感、女性经验和女性意识的作品。

“女性主义文学”,直接受欧美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之后产生的作品,本书将其归入女性文学概念之中。

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交叉重叠关系。

本文使用的“性别批评”概念涵盖了以前较为流行的女性主义批评或女权主义批评。

中国、韩国及欧美诸国的女性文学及其批评在相关概念的使用与互译上较为混乱,英语有关性别的词语,如“female”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feminine”指的“女性”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概念;“feminist”指政治意义上对于“女性”的认识与目标。

“性别”这个词在英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生理上的两性差别,这时的性别叫作“sex”;二是指由社会造成的两性差异,这时的性别叫作“gender”。人们,尤其是女性主义者认为,决定两性性别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方面而非生理方面,因此反对把某些气质特征或行为方式看成是某种性别的人所天生具有的,而是强调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对性别概念的这种社会性界定,在提倡一种看待性别问题的历史和发展眼光的同时,也促使文学批评者对批评传统作出反思,看其中是否含有某些基于对性别问题作僵化理解的性别成见乃至性别歧视的内容。

韩国与中国在地理上非常接近,生活在相同的儒教文化圈内,因此具有许多类似的女性问题。中韩两国的女性,在长久的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都受到儒教封建观念的束缚,屈从于父权文化的权威,遭受性别压抑,受到男性权力的支配,并且被教导顺从与娴静是良家妇女最高的美德。女性一直存在于社会与历史的底层和边缘。然而,随着历史、社会的变化,女性意识开始了觉醒。

如果将中国女性文学的理论加以整理,可以看到混合使用“女性文学”、“女子文学”、“妇女文学”、“女流文学”等称谓。在

韩国,有关女性文学的争议也相当多样化,“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性解放文学”、“Feminism(女权主义)文学”等也都被混用。事实上,这些称谓只是用词上有所不同,内容并无太大差异。

无论使用何种称谓,女性文学的真正内涵应该是表现以女性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将女性的独特生活领域作为文学表现对象,其中也应包含人类生活普遍的、共同的精神与思想意义。这是可以对中韩两国女性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同时应当看到,东西方女性的生存环境之间差异很大,这必然导致东方女性作家与批评家在接受西方影响的角度与策略上产生文化张力。这种性质的张力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中韩两国之间。本书将在第五章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本书所使用的某些概念与批评前提,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恕不能一一列举其来源与出处。

第一章 现代中韩女性文学回顾

第一节 儒家文化圈传统伦理体系内的女性角色

人类自进入父权社会以来,曾经产生过三大矛盾——性别冲突、民族冲突和阶级冲突,其中性别冲突是产生时间最早的人类矛盾。性别歧视,主要是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是这个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封建社会是人类性别歧视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从世界范围来说,封建时期的中国、韩国也是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比较严重的国家,这与东方封建社会特殊的文化结构有关。

在封建伦理体系内,女性被规定为从属与依附的角色。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夫妻关系是人伦关系的基石,所谓“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渊源极深的中韩两国封建文化都十分重视妇女在社会伦理结构当中的这种重要功能。男女、夫妻与天地、阴阳被纳入社会的主从式结构中,而女性角色的顺从与否对这个等级制伦理体系的安危关系重大。因此社会文化长期以来对女性进行了顺从与被动的训导与防范。历史上,不

仅女性的失落与悲剧感来自这个结构,女性的幸福与安全感同样也大体来自这个结构。

阴阳观念在官俗两个层面上,统治中国文化数千年之久。从最高的政治伦理层面一直到医疗与婚俗,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在老子那里,“阴阳”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平衡的因素,并无主从尊卑之分。如果硬要说老子更看重哪一个,那就是与女性相通的“阴”。例如,老子曾说:“牝常以静胜牡。”词序在汉语表意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老子的语言时代,涉及“雌雄”、“牝牡”、“阴阳”等词汇,都将阴性成分前置。“乾坤”这样的对偶概念,最早也是“坤”在前,“乾”在后。而稍后通行的“男女”、“天地”、“夫妻”,却将阳性成分前置,这也正是阴阳观念失去平衡、开始倒置的表现。古老的阴阳观念,逐渐被儒学改造成泾渭分明的主从系统,即天主地从、阳主阴从、男主女从;落实到伦理层次,就变成了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男尊女卑。《周易·说卦》已经开始如此行文:“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健也;坤,顺也”。到了司马光手里,他在《训子孙》一文中对此的发挥则更进了一步: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

这种主从模式在社会实践层面,则长期被置于法律和暴力

参见叶舒宪、萧兵:《老子的文化解读》下篇第一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